

企业环境治理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张玉娟¹, 郭艳平²

¹西南政法大学, 商学院, 重庆

²菏泽化工高级技工学校, 山东 菏泽

收稿日期: 2021年12月29日; 录用日期: 2022年1月20日; 发布日期: 2022年1月27日

摘要

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高质量发展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企业作为污染物排放的主体, 是绿色发展环境治理的关键环节, 剖析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因素, 是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助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现有文献主要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角度探讨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因素, 也有部分文献着重分析了机构投资者在企业环境治理中所起的作用。通过对已有研究文献的梳理, 以为完善企业环境治理提供经验证据, 为助推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政策依据。

关键词

企业环境治理, 正式制度, 非正式制度, 机构投资者

Review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Yujuan Zhang¹, Yanping Guo²

¹Business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²Heze Chemical Senior Technical School, Heze Shandong

Received: Dec. 29th, 2021; accepted: Jan. 20th, 2022; published: Jan. 27th, 2022

Abstract

The Six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19th CPC Central Committee stressed tha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s ecological priority and green development. As the main body of pollutant emission, enterprises are the key link of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n green development. Analyz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is an important content to realize green and low-carbon development and boost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mainly discuss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mal system and informal system. Some literatures also focus on the role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in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rough combing the existing research literature, we hope to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for improving enterpris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and provide policy basis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words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Formal System, Informal System, Institutional Investor

Copyright © 2022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 2035 年远景目标和“十四五”规划在新的时代背景下, 提出“生态环境根本好转”、“广泛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成效”的奋斗目标, 在此背景下, 如何推进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话题。在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企业环境治理是绿色发展的重中之重, 要主动承担环境治理主体责任。

以往关于企业环境治理影响因素的研究, 主要从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两大角度展开。正式制度主要探讨了正式的环保制度及法律法规、监管力度、环境规制的政策工具以及机构投资者等方面, 而非正式制度的研究则主要涉及了传统文化、社会及媒体监督、非正式关系等因素。大多数研究聚焦于某一个因素或某一类因素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 忽略了这些因素间的互相影响, 以及协同效应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

2. 正式制度因素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

正式制度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 主要研究国家及各级政府制定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对企业环境治理的监管和要求[1]。国家相关制度、政府能力及监管水平会影响企业的环保投资, 进而影响企业环境治理。根据已有研究文献, 学者们对主要从以下方面探讨正式制度因素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

第一, 正式的环保制度及法律法规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

在明确具体的正式监管制度下, 企业会积极加强环境治理。可见, 正式制度对企业环境治理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2]-[7]。正式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有利于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6] [8], 强制的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政策显著提高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环境司法专门化有效地促进该地区企业进行环境治理。环保制度及法规有利于企业投资清洁环保技术[9]、加强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10], 从而促进企业提升企业环保绩效。Li 等(2016) [11]发现环境合法性促进企业碳信息披露, 丰富了企业会计信息披露的内容。良好的制度环境, 有利于环境法规及规章制度的有效实施, 从而对企业的环境治理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于正式制度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 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认为正式制度不利于企业环境治理[12] [13], 正式制度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解释强度不够。

第二, 监管力度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

环保立法在环保执法力度严格的地区对环境的改善效果明显[14], 中央政府的环保监察措施显著降低了企业污染物的排放。企业管理者面临的政府环境规制压力越大, 企业进行技术创新转型升级的意愿越

强烈。季晓佳等(2019) [15]研究认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和政府监管不相关。

第三, 环境规制的政策工具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

现阶段我国环境规制体系的政策工具有排污收费、环保补助、排污权交易等。排污收费和环保补助作为主要的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 可以结合使用以提升企业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 从而达到环境治理的作用。排污收费显著增强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 排污权交易试点的实施有利于企业的绿色创新活动[16], 这些对企业环境治理有益。企业获取环保补助后, 要结合政府的意愿加强环保投资, 从而承担更多的环境保护责任[17], 但也有学者研究发现环保补助减弱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力, 从而促进企业加强环境治理。

3. 非正式制度因素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

相对于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对企业环境治理的约束, 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也不容小觑。非正式制度主要包括了传统文化、宗教信仰、风俗习惯、道德规范、政治关联、校友关系、老乡关系等。根据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研究, 鉴于非正式制度比正式制度的约束力更强, 主要是由于其延续性[1]。可见, 研究非正式制度[18] [19] [20]对微观个体和企业行为的影响, 对于企业行为选择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 传统文化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

中国的传统文化分为正统文化、宗教文化以及鬼神文化三大部分[21]。传统文化有助于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 强化了制度环境对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作用[21], 促进了企业的低碳转型)。企业所在地区的儒家文化强度越高, 企业的环保力度越强[19]。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影响消费者的环保行为选择[22]。宗教信仰影响企业行为选择[23], 促进了企业社会环境责任的履行[24]。

第二, 社会及媒体监督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

社会公众监督和道德规范有利于企业环境治理。高管的道德感义务有利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25]。经理人压力和投资者压力显著地促进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媒体与其他压力群体对企业环境行为的监督, 会促使企业积极应对环境问题、加强企业环境会计信息的披露[26]、加大环保透露力度[27]媒体监督作为非正式制度对企业环境治理的作用在不断的加强。

第三, 非正式关系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研究。

非正式关系包括政治关联、家乡认同、校友关系等, 有利于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履行[25], 高管对企业所在地的认同感越强, 对企业环境标准要求越高, 环保意愿更强[28], 从而促进企业环境治理。政治关联正向促进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29]。党组织嵌入到企业、董事会和监事会都能显著的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30]。

4. 其他因素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

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提高企业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 有利于企业加强环境治理。作为企业重要的外部股东和利益相关者, 机构投资者凭借其特有的资源优势, 一方面确保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 以便及时发现企业环境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督促其及时改正[31]; 另一方面, 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 提高了企业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32]。可见, 机构投资者对于企业加强企业环境治理至关重要。

已有研究文献在探讨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环境治理之间的关系时, 考虑到不同的机构投资者由于其自身性质[33]和参与公司治理意愿的差异[32], 认为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环境治理存在促进效应、亦存在抑制效应。单独研究某一类机构投资者影响企业环境治理的文献较少, 一般是先按照一定标准将机构投资者进行分类, 再分类进行研究。相对于交易型机构投资者, 稳定型机构投资者更能促进企业信息的披露[34]。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社保基金作为压力抵制型机构投资者, 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正相关, 保险、银行、

信托和券商作为压力敏感的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负相关[32]。长期机构投资者相较于短期机构投资者而言,更倾向于对管理层进行监督和积极参与公司治理[35][36],更关注公司长期发展,从而致力于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37]。保险类机构投资者秉承长期投资的理念,对企业环境治理有利。鉴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保险公司和信托公司类投资者的社会属性,更多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在追求环境保护方面,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保险类机构投资者表现的更为积极。

基于企业行为理论,机构投资者加强企业环境治理的行为决策受其偏好、文化、认知、能力等多方面的影响。家乡认同作为一种地域偏好的非正式制度因素,对企业所在地的认同感越强,对企业环境标准要求越高,环保意愿更强[38],从而促进企业环境治理,有利于企业环境社会责任的履行。儒家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植根于人的思想中,对行为的影响更深刻[39],对企业决策也具有一定的约束和指导意义,尤其是对企业环境治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等涉及伦理道德一类的企业决策[19]。

4.1. 机构投资者与企业环境治理

近年来,以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基金、银行、保险、信托及券商等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发展迅速,成为资本市场的中坚力量[32][33]。机构投资者作为资本市场的重要内容之一,约束管理层,监督大股东[32],制约控制型董事会[32][33],减少了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矛盾[40],并致力于降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程度[41],从而使得企业的环境问题更容易被关注,促使企业积极应对环境治理。

从机构投资者特点出发,相对于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拥有充分的信息资源优势、专业的分析团队、丰富的管理经验等自身核心资源,使得它们能有效的收集、筛选、甄别和处理信息[42]。这些核心资源,一方面确保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以便及时发现企业环境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并督促其及时改正[31];另一方面,缓解信息不对称,提高了企业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32]。可见,机构投资者能有效促使企业加强企业环境治理。

基于代理成本理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用脚投票”的交易成本越高、效率越低。作为中小股东的代表,机构投资者会提高自愿性信息披露水平,积极主动参与公司治理[43],以更好履行受托责任,并督促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32]。机构投资者的使命感使其重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以及长期财务绩效,而企业环境绩效的下降对企业长远发展不利,所以,机构投资者会更多关注企业的环境问题[37],从而有助于企业加强环境治理。

此外,研究表明,机构投资者在投资时更倾向于环境信息披露较好的企业[37]。机构投资者参与企业环境治理,不仅督促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自身也受益匪浅,可见,机构投资者于企业环境治理而言有利。

4.2. 机构投资者地域属性与企业环境治理

就机构投资者异质性而言,不同类型的机构投资者在资金规模、交易模式、信息处理能力和管理方式等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导致投资偏好[44]和治理效应[36]的差异。地域属性优势使得当地机构投资者更接近环境治理区域,加强该区域企业环境治理,对于改善当地机构投资者的生态环境有利,所以相对于外地机构投资者,当地机构投资者致力于企业环境治理的意愿更强烈。基于信息优势理论,地域属性不仅影响着信息获取的成本[45],也影响着获取信息的质量和数量。所以,具有地理位置优势的本地机构投资者更方便与本地的利益相关者进行沟通,获取更多非正式非公开的信息[45],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强化对管理层行为选择的监督[46],比外地机构投资者在企业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36],从而在企业环境治理方面更具有话语权。

从决策有用性动机出发,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本土偏好(home bias)”[45]、“熟

悉性偏好”等,均影响着机构投资者的决策行为,当地机构投资者积极投身于企业环境治理,能为其带来更大的形象价值,提升其在本地的声誉,这些都促使当地机构投资者更倾向于加强企业环境治理。有限注意理论也提出,机构投资者参与投资企业的注意力和资本有限,机构投资者的资本配置也是其注意力和资本再分配的过程,基于以上分析,他们更有意愿参与到本地企业的公司治理中,进而将更多的资源配置到本地企业,从而加大大地企业环境治理的投资力度。可见,与外地机构投资者相比,当地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环境治理更有利。

4.3. 儒家文化对在机构投资者影响企业环境治理中的效应

作为在中国传承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儒家文化对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等各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47][48]。儒家文化以孔孟为代表,以“仁”为核心思想,其中所蕴含的“德治”主义主张以道德感化和影响人的行为,提倡以较高的道德标准约束自我。儒家文化促进了社会公众伦理道德水平的提升,形成了较强的社会舆论,进而对他人行为进行约束[49]。可见,儒家文化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的思想以及行为选择[47][48],对企业决策也具有一定的约束和指导意义,尤其是对企业环境治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等涉及伦理道德一类的企业决策[19]。已有研究表明,儒家文化不仅促使企业约束自身行为,同时也提高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积极性[50]。

儒家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仁爱万物”等经典学说描述了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彰显了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观点[19],鼓励企业加强环境治理。儒家文化的“信”、“义”引导人们多行善事,并告诫“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可见,儒家文化的熏陶对企业环境治理有利。在儒家文化影响深远的地区,企业在环境治理行为选择中受到儒家文化熏陶,以较高道德标准约束自己,增加企业环保投资,提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与质量,促进企业积极主动地加强环境治理。

5. 结论

综上所述,从正式制度角度解析企业环境治理影响因素的文献较多,也较为成熟;非正式制度影响企业环境治理的研究主要探讨了传统文化、媒体报道、社会监督、道德规范及非正式关系等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此外,还有较多学者探讨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以及地域属性在机构投资者影响企业环境治理中的调节效应。在研究机构投资者影响企业环境治理中,除了地域属性以外,非正式制度因素不应该被忽略。由此,在后续的研究中,试图从儒家文化和家乡认同这两个视角,分析非正式制度在机构投资者影响企业环境治理中的中的作用。

基金项目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重庆市大数据金融审计体系构建研究”(2019YBGL052)。

参考文献

- [1] 胡珺, 宋献中, 王红建. 非正式制度、家乡认同与企业环境治理[J]. 管理世界, 2017(3): 76-94.
- [2] Spence, L., Jeurissen, R. and Rutherford, R. (2000) Small Business and the Environment in the UK and the Netherlands: Towards Stakeholder Cooperation. *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 **10**, 945-965. <https://doi.org/10.2307/3857841>
- [3] Worthington, I. and Patton, D. (2005) Strategic Intent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Green Environment within SMEs: An Analysis of the UK Screen-Printing Sector. *Long Range Planning*, **38**, 197-212. <https://doi.org/10.1016/j.lrp.2005.01.001>
- [4] Bradford, J. and Fraser, E.D.G. (2008) Local Authorities, Climate Change and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Identifying Effective Policy Instruments to Reduce Energy Use and Carbon Emission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 Management*, **15**, 156-172. <https://doi.org/10.1002/csr.151>

- [5] 沈洪涛, 冯杰. 舆论监督、政府监管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J]. 会计研究, 2012(2): 72-78.
- [6] 毕茜, 彭珏, 左永彦. 环境信息披露制度、公司治理和环境信息披露[J]. 会计研究, 2012(7): 39-47.
- [7] 沈洪涛, 周艳坤. 环境执法监督与企业环境绩效: 来自环保约谈的准自然实验证据[J]. 南开管理评论, 2017, 20(6): 73-82.
- [8] 蔡春, 郑开放, 陈晔, 王朋. 政府环境审计对企业环境责任信息披露的影响研究——基于“三河三湖”环境审计的经验证据[J]. 审计研究, 2019(6): 3-12.
- [9] Klassen, R.D. and Whybark, D.C. (1999)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n Operations: The Selection of Environmental Technologies. *Decision Sciences*, **30**, 601-631. <https://doi.org/10.1111/j.1540-5915.1999.tb00900.x>
- [10] 于连超, 张卫国, 毕茜, 董晋亭. 政府环境审计会提高企业环境绩效吗? [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20, 35(1): 41-50.
- [11] Li, D., Huang, M., Ren, S., Chen, X. and Ning, L. (2016) Environmental Legitimacy, Green Innovation, and Corporate Carbon Disclosure: Evidence from CDP China 100.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50**, 1089-1104. <https://doi.org/10.1007/s10551-016-3187-6>
- [12] 梁平汉, 高楠. 人事变更、法制环境和地方环境污染[J]. 管理世界, 2014(6): 65-78.
- [13] 余长林, 高宏建. 环境管制对中国环境污染的影响——基于隐性经济的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 2015(7): 21-35.
- [14] 包群, 邵敏, 杨大利. 环境管制抑制了污染排放吗? [J]. 经济研究, 2013, 48(12): 42-54.
- [15] 季晓佳, 陈洪涛, 王迪. 媒体报道、政府监管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J]. 中国环境管理, 2019, 11(2): 44-54.
- [16] 齐绍洲, 林岫, 崔静波. 环境权益交易市场能否诱发绿色创新?——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绿色专利数据的证据[J]. 经济研究, 2018, 53(12): 129-143.
- [17] 张琦, 郑瑶, 孔东民. 地区环境治理压力、高管经历与企业环保投资——一项基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的准自然实验[J]. 经济研究, 2019, 54(6): 183-198.
- [18] Fracassi, C. and Tate, G. (2012) External Networking and Internal Firm Governance. *The Journal of Finance*, **67**, 153-194. <https://doi.org/10.1111/j.1540-6261.2011.01706.x>
- [19] 淦未宇. 儒家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 基于第十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的实证检验[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1): 115-132.
- [20] 王建秀, 刘星茹, 尹宁. 社会公众监督与企业绿色环境绩效的关系研究[J]. 经济问题, 2020(8): 70-77.
- [21] 毕茜, 顾立盟, 张济建. 传统文化、环境制度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J]. 会计研究, 2015(3): 12-19.
- [22] 劳可夫, 王露露.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对环保行为的影响——基于消费者绿色产品购买行为[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15, 17(2): 64-75.
- [23] Dyreng, S.D., Mayew, W.J. and Williams, C.D. (2012) Religious Social Norms and Corporate Financial Reporting. *Journal of Business Finance & Accounting*, **39**, 845-875. <https://doi.org/10.1111/j.1468-5957.2012.02295.x>
- [24] Du, X. (2013) Does Religion Matter to Owner-Manager Agency Costs?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18**, 319-347. <https://doi.org/10.1007/s10551-012-1569-y>
- [25] 周敏奇, 何昌清, 古继宝. 高管感知道德义务、地方依恋与企业环境责任: 基于高阶梯队理论的视角[J]. 预测, 2020, 39(4): 68-75.
- [26] Clarkson, P.M., Li, Y., Richardson, G.D. and Vasvari, F.P. (2008) Revisit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An Empirical Analysis. *Accounting, Organizations and Society*, **33**, 303-327. <https://doi.org/10.1016/j.aos.2007.05.003>
- [27] 王云, 李延喜, 马壮, 宋金波. 媒体关注、环境规制与企业环保投资[J]. 南开管理评论, 2017, 20(6): 83-94.
- [28] Tonge, J., Ryan, M.M., Moore, S.A. and Beckley, L.E. (2015) The Effect of Place Attachment on Pro-Environment Behavioral Intentions of Visitors to Coastal Natural Area Tourist Destinations.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54**, 730-743. <https://doi.org/10.1177/0047287514533010>
- [29] Cheng, Z., Wang, F. and Keung, C. (2017) Will Corporate Political Connection Influence th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Disclosure Level?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A-Shares from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Stock Market.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43**, 209-221. <https://doi.org/10.1007/s10551-015-2776-0>
- [30] 于连超, 张卫国, 毕茜. 党组织嵌入与企业社会责任[J]. 财经论丛, 2019(4): 61-70.
- [31] 关键, 阙弋. 绩效反馈、机构投资者持股与企业环境绩效关系研究[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26(4): 124-138.
- [32] 王垒, 曲晶, 刘新民. 异质机构投资者投资组合、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价值[J]. 管理科学, 2019, 32(4): 31-47.

- [33] Borochin, P. and Yang, J. (2017) The Effects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 Objectives on Firm Valuation and Governance.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126**, 171-199. <https://doi.org/10.1016/j.jfineco.2017.06.013>
- [34] Ward, C., Yin, C. and Zeng, Y.Q. (2018) Institutional Investor Monitoring Motivation and the Marginal Value of Cash.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48**, 49-75. <https://doi.org/10.1016/j.jcorpfin.2017.10.017>
- [35] 刘京军, 徐浩萍. 机构投资者: 长期投资者还是短期机会主义者? [J]. 金融研究, 2012(9): 141-154.
- [36] 李万福, 赵青扬, 张怀, 谢勇. 内部控制与异质机构持股的治理效应[J]. 金融研究, 2020(2): 188-206.
- [37] 黎文靖, 路晓燕. 机构投资者关注企业的环境绩效吗?——来自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金融研究, 2015(12): 97-112.
- [38] 迟铮, 王佳元. 环境质量、高管家乡认同与企业环保资产投资[J]. 宏观经济研究, 2021(9): 149-160.
- [39] 张维迎. 制度企业家与儒家社会规范[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1): 16-35.
- [40] Shleifer, A. and Vishny, R.W. (1986) Large Shareholders and Corporate Control.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94**, 461-488. <https://doi.org/10.1086/261385>
- [41] Cornett, M.M., Marcus, A.J., Saunders, A. and Tehranian, H. (2007) The Impact of Institutional Ownership on Corporate Operating Performance.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31**, 1771-1794. <https://doi.org/10.1016/j.jbankfin.2006.08.006>
- [42] 张蕊, 管考磊. 高管侵占型职务犯罪、机构投资者与市场反应——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会计研究, 2017(12): 52-58.
- [43] David, P. and Kochhar, R. (1996) Barriers to Effective Corporate Governance by Institutional Investors: Implications for Theory and Practice. *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 **14**, 457-466. [https://doi.org/10.1016/0263-2373\(96\)00039-4](https://doi.org/10.1016/0263-2373(96)00039-4)
- [44] 毛磊, 王宗军, 王玲玲. 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筛选策略与企业社会绩效[J]. 管理科学, 2012, 25(3): 21-33.
- [45] 宋玉, 沈吉, 范敏虹. 上市公司的地理特征影响机构投资者的持股决策吗?——来自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J]. 会计研究, 2012(7): 72-79+97.
- [46] Ayers, B.C., Ramalingegowda, S. and Yeung, P.E. (2011) Hometown Advantage: The Effects of Monitoring Institution Location on Financial Reporting Discretion.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52**, 41-61. <https://doi.org/10.1016/j.jacceco.2011.03.003>
- [47] 张维迎. 制度企业家与儒家社会规范[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3(1): 16-35.
- [48] 杜维明. 儒家伦理与东亚企业精神[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3.
- [49] 邹萍. 儒家文化能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吗? [J]. 经济管理, 2020, 42(12): 76-93.
- [50] 徐细雄, 龙志能, 李万利. 儒家文化与企业慈善捐赠[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20, 42(2): 124-136.